

## 近代日语词汇体系型化过程中汉语同构现象解析： 基于农科词汇的实例解释

李 红

**摘要：**汉语是近代日语形成过程中共同建构的成员，至今仍广泛流行、使用频繁。本文以近代日语农科词汇的型化实例为示范，通过对汉语借用现象、汉语借用特点及其实质的分析与讨论，阐明了汉语与近代日语词汇密不可分的关系和不可或缺的同构作用，为重新审视东亚地区的词汇环流现象以及汉语的地位问题，尤其是对近代学科术语生成的影响研究，提供一定的启示和参考。

**关键词：**近代日语词汇；汉语；同构；农科词汇；实例

### 问题的提出

现代汉语词汇体系的建设与构型与近代日语词汇的引入、借鉴有一定的关系。如“社会”、“关系”、“影响”、“抽象”、“主观”、“哲学”、“命题”（沈国威，2008：13-14.）等日源词汇的导入与吸纳，对译介新事物、解释新概念、建构现代汉语词汇体系起到了重大的补缺作用。不过，在研读此类论文的过程中笔者发现，日源词汇对现代汉语的作用与影响成为学者们关注的重点。如，日本关西大学亚洲文化研究中心的沈国威教授及其团队在近代新语、译语研究方面成果丰硕，引人注目。沈国威在他的著作中曾就研究主旨说明：“从汉语的立场，以近代以后流入汉语的日语词汇为焦点，考察流入的时期、路径、受容的方法、固定（或淘汰的过程）、词汇的变化以及作为外来语的特异性等”（同上，沈国威，2008：1.）。基于此，在考察日本近代新汉语的生成与受容、近代日中语义交流史上，陈力卫进一步提出甲午战争后面对日语新名词的大量涌入，“《辞源》、《辞海》等近代辞典在处理这一现象时，本应成为我们观察日语新词融入中文的一个指标，但在文化保守主义的大旗下，实际上辞典却采取了一种避重就轻的迂回策略，一方面强调部分日语词的出处，而另一方面则用西文对译的方式消解来自日文的新词新概念，巧妙地迎合了当时的社会氛围，这种做法也留下了一些隐患”（沈国威、内田慶市，2014：283）。陈力卫教授的评论表明我们对日语借词的界定工作不够严谨细致，另一方面也示意日语借词的输入数量可能会更多，影响也更大。

正是通过对以上问题的思考，笔者注意到国内学者很少将研究视点放在汉语对近代日语建构的贡献上。即使有篇幅涉及，也往往如蜻蜓点水，不够深入。如今回首那段历史，我们会发现，明治变革时期，面对大量西方词汇的涌入，尤其是专业性很强的学科术语，日本学者并没有采用传统语言“和语”即“假名”的翻译方式，而是千方百计地利用汉语翻译西语，构成“日语新译词”。受此影响，日本甚至出现了空前的汉语大流行现象。这种现象深入庶民生活和全民教育活动中，其

范围之广、规模之大完全有别于平安朝时期仅在僧侣和贵族间流传的汉字学习情况。日本学者也认为“对于明治时期的翻译者来说，如果不曾有过汉语学习训练、不具备自由操控汉语的能力，他们所从事的翻译大事业是无论如何都无法实现的”、(加藤周一·丸山真男，1991：350。)可见，在近代日语体系创建之初，汉语就以“原始合伙人”身份参与其中，共同组建、构成了新的词汇系统。时至今日，这些词汇的绝大多数仍以高频率使用态势活跃在日语中。因此，重新审视汉语的同构作用，对全面而理智地看待东亚地区的词汇环流现象以及语言的近代化建设，尤其是关乎近代学科构建的术语体系的发生、发展与确立，将起到一定的参考作用。

### 一、近代日语词汇体系建构与汉语同构

近代日语是指明治政府成立后，为适应国家近代化建设逐步建立的以东京中流社会普遍使用的词汇、语法、语音、声调为标准语言体系（日本放送协会放送史编修室，1965：427）。近代化建设需要以近代先进的科技知识为先导，而知识的描述、表现与传递首先要从使用近代词汇开始。日本著名学者杉本つとむ认为“所谓（近代）词汇，是讲述生活的基本手段，同时也是新思潮的表现。是理解近代日本的精神轨迹、行动实态的有力构造之一”（杉本つとむ，1998：314.）、沈国威先生也认为“近代新词，尤其是其中抽象词汇的部分是西方文明的承载体和传播者，有时甚至被视作西方文明的本身”（沈国威，2008（1）：72-88.）。可见，近代日语词汇的产生、发展与确立是在日本国家近代化建设的现实需求下应运而生的。新概念、新知识在国家“文明开化”、“脱亚入欧”的大旗下如潮水般地蜂拥而来，如何认识、介绍和命名它们，是近代汉语词汇体系得以建构的首要任务。但是，在翻译过程中这些翻译家们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他们发现使用日本原有的语言——“和语”根本无法完成这一艰巨的任务，必须使用汉语来解决这一旷世难题。理由根据如下：

首先，从历史演变结果来看，在漫长的时间过程中“和语”在很大程度上形成了对汉语的依存关系，这决定了现有日语语言系统的特点与选择。历史上，汉日语言交流密切频繁、源远流长。据《日本书纪》、《古事记》、《续日本纪》记载，公元405年乐浪郡（公元前108-公元313年，汉朝政府设立在朝鲜北部的地方管辖机构）人王仁受应神天皇的邀请，赴日教授皇子兔道稚郎子汉文，并随机献上《论语》及其释文共十卷，至此汉语传入日本。八世纪末，汉语逐渐演变成日本官方书面表达语言。十世纪初，日本出现了自己的文字——假名。假名分为平假名和片假名两种，分别借用汉字的草体和偏旁转化而来，故称“和字”，即“和制汉字”的意思。“假名诞生之前（日本人）只用汉字书写日语。所以，长久以来汉字是书写日语的文字。随着时间的流逝，日语许多方面都发生了变化，而‘使用汉字书写日语’的事实却从未改变。就‘书写’一方来看，汉字与日语的关系已亲密无间、无法分开。”（今野真二，2014：8.）基于此，以一字一音节的方式主管表音的“和字”系统，与主管书写表意的汉字系统不断磨合演变、各司其职，至十九世纪中叶已共同构筑起了传统的日语词汇系统。明治时期，当“和语”无法满足实际需求时，早已进入系统内的汉语近水楼台，首先具备了被优先选择的可能条件。

其次,从语言使用的现实性、工具性来看,“和语”实用具体、表意简单,紧贴日本人的日常生活,生动而具体地描绘现实景观的词汇很多,这主要围绕渔业、种植业等生活环境展开。而与日本人不搭边的畜牧生活词汇就显得极为匮乏。汉语体系有与之对应的字或词,因此,这些词汇的一一对译需要参照、借用汉语来完成。如,日本是海岛国家,国民以食鱼为主,因而有关鱼类的“和语”词汇异常丰富。仅以鲈鱼为例,幼鱼叫“コッパ(koppa)”,体长十五厘米以下叫“はくら(hakura)”;一岁且体长介于十五厘米至十八厘米之间的叫“セイゴ(seigo)”或“デキ(deki)”。两岁到三岁且体长在35厘米左右的分别叫做“ハネ(hane)”、“フッコ(fukko)”、“マタカ(mataka)”、“マダカ(madaka)”。四岁以上且体长在六十厘米以上的叫做“スズキ(suzuki)”。有关肉食种类方面的词汇,传统和语只有一个“肉(niku)”,不像英语分为“牛肉(beef/veal)”、“猪肉(pork)”、“羊肉(mutton/lamb)”、“鸡肉(chicken)”、“鸭肉(duck)”、“鹿肉(venison)”等等。(垂水雄二,2010:6。)

第三、从词汇系统内部结构来看,“和语”基本词汇多集中在动词、形容词和助词范围内,叙事性、描述性等通过视觉器官感知的词汇多,富有概括性和抽象性、描述科学思想、理论逻辑的专业词汇却非常少。在日本人看来这类词与自己生活的世界偏离很远,抽象虚空、艰涩难懂,很难与“和语”形成对接,实现等价式翻译。如,“農事改良”、“農家經濟”、“農家收益”、“農業組織”、“作物遺傳”、“農業病理学”等等。这些词汇或直接源自中国或利用汉字翻新。“如果没有汉字的帮助,日语就不可能作为传达所有信息的手段被教授、被使用。这表明了日语(词汇)的匮乏。”(安江良介,1991:327。)

第四,从科技词汇的表记方式来看,中国明清时期对新词汇的翻译成果使日本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在享用来华传教士马礼逊、罗培德以及中国学者们的草创成果时,他们也顺便承袭了汉语的表记方式。最典型的莫过于方以智的《物理小识》。日本著名语言学家山本つとむ在其著作《近代日本語の成立与发展》中指出,兰学所使用的译词“宇宙”、“文理”、“真理”、“矛盾”、“石油”、“望远镜”、“体质”、“发育”等词汇《物理小识》中均有记载,经他随意截取的与近代日语有关的词汇竟多达271条。现在已有确切证据证明当时的日本学者对此书进行了参考与借鉴。如研究日本物产学的自然科学家平贺源内在其著作《物类品隲》(1763)中就某一词汇展开讨论时直接标示出“物理小识曰”。杉田玄白是日本最早、最完整的西洋医学译著《解体新书》(1774)的主要作者,1826年他的得意门生、著名兰学家大槻玄沢补译恩师的作品,刊行《重订解体新书》,在该书“翻译新定名义解”中明确指出在翻译和译语的选择上参看了《物理小识》。(同上,山本つとむ,1998:369-377。)这表明使用汉语表记专业术语已有先例,且是可行的。明治维新后,这种使用方式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并被快速推进,以最能提供证据的字典辞书为例,明治2年《萨摩辞书》,汉语占21.5%;明治6年(1873)《附音插图英和字义初版》,汉语占31.4%;明治15年(1882)《增补订正英和字义第二版》,汉语占36.2%;明治21年(1888)《附音插图和译英字义》,汉语占55.9%。(森岡健二,1991:7。)

总之,汉语获得认同的原因在于翻译事物概念,尤其介绍欧美人科技用语方面,起到了不可替

代的同构作用。兰学时代日本近代词汇建构初始时,语言的标记沿用传统上的做法全部使用汉语,重点在天文、地理、理化、历算、医术、药学、航海、炮术等领域逐步构建一定的词汇群,形成了早期的科学术语体系雏形。表明当时科技术语的生成与定型是汉语借用的重要表现形式。明治时期,国家在“法制、学制、农制、军制、经济制度、交通通信组织”等六大方面开展重点建设。其中“农制”建设事关国民生活与生存、以及为工业提供原料资金保障等重大问题而成为重中之重。明治5年(1872)农民人口占总人口(3311万人)的81.4%,(上田弘之,1981)农业是国家最亟待改革、提高科技生产力的部门。著名《官报》专门开辟了农工商栏目,有关农业方面的情报每期基本占用了两个版面。毋庸置疑,发展近代农业的第一要务是科技的推广与普及,不过学问首先由语言导入,而语言需由词汇表达,因此新式农科词汇的创制、使用与传播成为了这场革命的急先锋,也成为近代科技语言建构的焦点领域和示范标本。

## 二、农科词汇的汉语借用现象

基于上述内容,翻译和介绍欧美先进的农科知识是转型传统农业生产方式的第一步,也是必不可少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在这股风潮中官办报纸起到了引领和主导作用。因此,作者将考察的重点放在了当时最具有影响力的《大日本农会报》和《官报》上,从近代词汇的使用视角对汉语的借用情况分五类进行了概括梳理,即中国借用词、日本自创词、中日同形词、特殊词汇、词缀。中国借用词是指从中国古书、典籍中直接借入且在词汇内涵、外延中注入近代新意的词;日本自创词是由日本人自己发明、创制的新词;中日同形词是指无法考证来源出处且中日两国共同使用的词;特殊词汇是指按照新的构词法以双音节结构组合的四字词组或词组。笔者以《大言海》、《字源》、《广辞苑》、《辞海》等中日辞典为依据,参考森岡健二《近代語の成立・語彙編》、杉本つとむ《近代日本語の成立と発展》、罗布存德《英华字典》(1883年、1884年、1906年版),将词汇逐一比对、筛选后,归纳如下:

《明治23年大日本农会农谈会报告》(以下简称《农谈会报告》)

中国借用词:農事、農家、農時、農産、農政、菜種、耕地、水田、稞麦、選種、洋種、苹果、葡萄、豌豆、勸農、棉、粟、黍、系瓜、胡麻、晚稻、食糧、胡瓜

籠、笊、犁、唐箕、厩肥、人糞、鷄糞、農具、麻、芋、蜀黍、薄荷、慈姑、魚肉、牛肉、蕎麦、播種、藍、耕作、收穫、秋收、飼養、鬪鷄、交趾鷄、播植、繁殖、米糠、開墾、鋤草、刈草、器械、菜園、桑園、養蚕、養蜂、製茶、鷄卵、実験、試験、湿地、実地、

日本自创词:特有物産、農閑、農閑期、農園、農田、農工商、農産物、村内地主、稻穗、近江米、大阪早稻、稻作法案、塩水選種、寒水選種、無選土困種、農家副産物、繩張植、法德植、朝鮮式蚕室、蚕体解剖、米作、麦作、一毛作、二毛作、模範田、菜豆、農会講師、移植、栽植、同種蕃殖、異種蕃殖、大農、上農、中農、下農、苗代田、雜穀、乾鱈、溜水泥、虫害、病害、陸稻、田植、挿苗、茶部屋、野菜、夏成物、秋成物、農産物、在来鷄、圃作、余暇圃、水産肥料、肥料、人造肥料、堆積肥、顯微鏡、農産物品評会、列品館、機械、農業機械、茶園、藁灰

農学、農業科、農学士、試驗田、試驗地、試作、試作場、混同農、農家教育、農家收益、農家經濟、組合規約

農談会、農会、共進会、農場、農務局、農商務省、農業組合、組織、農学校

水稻名前：神力、四国、白玉、萬作、中村、白苗、高砂、半芒

室素質、主肥、有機肥料、無機質、大肥、肥料實驗、肥料小屋、衛生費

中日同形词：農村、稻草、稻種、蚕豆、良種、早稻、晚種、稻苗、稻作、大豆、小豆、種子、綿種、砂糖、甘蔗、早茄子、中茄子、晚茄子、冬瓜、復耕地、整地、油滓、酒粕、溝泥、飼育、石灰肥、養蚕地、蚕卵紙、荒蕪地、開墾地、栽培地、產地、田圃

日式词綴：～中、～上、～用、～化、～性

中日类词綴：

结尾型：～費、～料、～金、～額、～稅、～米、～產、～地、～田、～糞、～栽培、～肥料、～病、～害、～育、～室、～場、～書、～会、～法、～量、～品、～期、～器、～機械、～者、～家、～員、～業、～生、～種、～類、～表

接头型：最～、好～、諸～、製～、我～、不～、總～

明治 20-24 年官报 1094 号、1059 号、1471 号、1564、1817 号、2188 号、2402 号有关农业术语如下：

中国借用词：灌溉、耕作、實驗、發芽、粉碎

日本自创词：農作物、肥料、水撰、苗代、腐熟、農商務省、農業事務所、食料植物、生草肥、物產共進会、炭疽皮疽伝染病、皮疽病、養蚕伝習所、磷酸分、畜類、室素、收額、精米場、稻種寒水浸、伝染馬病、品評会、共進会、種苗交換会、試作、農作物、实地調查、地方稅、補助金、醬油製造場、味噌製造場、水車機械場、養蚕場、釀造場

中日同形词：良種、稻草、早稻、耕作物、荒蕪地、場地、貿易品、漁家、腐敗、腐蝕、蚕業、繭種、米商会所、農作物

日式词綴：～上、～中、～用、～性

中日类词綴：

结尾型：～業、～法、～家、～產、～品、～場、～分、～種、～肥料、～栽培、～病、～害

接头型：諸～、不～

### 三、农科词汇的汉语借用特点及实质分析

从目前语言学界对词的一般定义来看，主要是围绕着语音、语义、语法核心三要素展开的。可以概述为词是“语音与语义的结合体”、“最小的造语单位”、“可以独立运用的造语单位”等。（葛本仪、王立庭，1992（4）：31-35.）基于此，新词的创制必须具备一定的语音形式、描述概念性意义、可组合使用的语言材料等三个基本语素。简而言之，就是可发音性、可概括性与可繁殖性。日本近代农科词汇的出现与成型正好满足了这三个基本要素的要求。基于上述汉语借用材料试分析



如下:

1、出现大量模仿汉字发音的中日借用词和中日同形词。农科词汇以“音读”形式仿借汉语发音,除了“慈姑”(ku-wa-i)、“死茧”(shi-ni-ma-yu)、“混合”(ma-ze)、“饲养”(o-da-te)等特殊“训读”读音外,借音形式的情况占压倒性多数。如上文提到的词汇:

農事(nou-ji)、農家(nou-ka)、農作物(nou-saku-butu)、肥料(hi-ryou)、良種(ryou-syu)、養蚕場(you-sann-jyou)、試驗地(shi-kenn-chi)、農業改良(nou-gyou-kai-ryou)、農家教育(nou-ka-kyou-iku)等。

2、出现大量使用汉字表达抽象概念的新名词。1956年日本著名国语学者大野晋发表了轰动学界的“大野词汇法则”。从万叶集(759以后)到源氏物语(1008)包括期间“徒然草”、“方丈记”、“枕草子”等九部优秀古典作品为研究对象,对名词、动词、形容动词、形容词的构成频率进行数据统计时,他发现如果以各部作品为节点划线连接的话,名词呈直线下降趋势,其他词汇则呈直线上升趋势。显然,传统日语名词具有先天发育不足的缺点。使用汉字表达抽象概念弥补了这一不足,这在农科日语上尤为明显。如上述词汇農談会、農会、共進会、農場、農務局、農商務省、農業組合、組織、農学校等农业组织的命名、農学、農業科、農学士、試驗田、試驗地、試作、試作場、混同農、農家教育、農家收益、農家經濟等农业科技名词的使用等,都大大丰富了当时的专业词汇系统。

3、出现大量类词缀现象。语言富有生命力的重要表现是其具备强大的增殖能力,而大量类词缀现象的出现往往是这种能力的反映。如《农谈会报告》中以“法”、“費”、“家”、“者”、“期”、“量”、“用”、“最”、“不”等前后词缀为例:

法:農業保險法、耕作法、稻耕種法(漢語)、選種法、水撰法、土宜便法、習慣法、獎勵法、稻作改良法、治水法、栽培法、農業簿記法、葡萄栽培法、肥料增加法、牛馬飼養法、肥料栽培法、插植法、收納法、苗養成法、飼育法、驅除法、防除法、蕃殖法、管理法、貯繭法、灌溉法

種:惡種、蚕種、黴菌、麥種、胡瓜種、交換種、在來種、純粹種、純粹乘用種、農用種、純粹短角種、純粹貨車用種、雜種

費:施肥費、插秧費、除草費、整地耕鋤費、收納費、雜費、製造費、農具修繕費、經費、培養費、蒔付費、驅虫費、會議費、諸費、獎勵費

家:實業家、農業家、老農家、農事熱心家、生糸家、稻作家、學術家、養蚕家、製糸家、種禽家、

期:收穫期、刈期、除草期、播種期、移植期

量:播種量、播量、用量、種量、收量、肉量

用:肥料用草刈場、隣村用惡水、釀造用、馬車用、種子用、費用、繁殖用、生食用、罐藏用、肉用、食用

最:最有效、最良種、最進步

不:不利益、不健康、不親切

从语用机能来看,语言的效益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传达机能”的实现。“传达机能”是以语法、发音为手段以词汇为单位的意义与概念的传达,目的在于有效地促成人与人之间交流。它的交际性和实用性是语言富有活力,得以代代传承、不被湮灭的基本要因。二是“描写机能”,又叫“叙述机能”的达成。它像“将对象定格在胶片中的照片、将现实的声音录音在胶带上的录音机那样,通过人的头脑作用将世界上的所有的现象、事物表现在语音、文字上。”(鈴木孝夫,2007:3.)描写功能的目标在于实现人们对世界的认识和思考。它的叙述性、记录性是语言更富有持久生命力、促进人类文明水平向纵深处演进的重要手段。“传达机能”与“描写机能”是对立统一的关系,二者既有区别又相互作用,在语用语境中起着不可分割的作用。

基于上述陈述,长期处于稻作农耕社会的日本,其“传达机能”和“描述机能”主要围绕水稻栽培、水力利用、田间管理、虫害防治、精耕细作、地力保护等劳动密集型生产方式展开的,在遭遇了以畜牧兼小麦为主要生产形式,以机械使用为主要手段的近代西方农业文明时,明治时期的农科词汇体系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无论是人们对西方农业科技的文字描述还是口语表达,都无法在传统的农业语境中找到标准和答案。

翻译学者们绞尽脑汁、千方百计地探寻两种语言在词汇语境中如何实现代价最少、误差最小的对接。他们发现或潜意识地注意到问题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两种机能的实现上。为了解决这一难题,需要从两个方面入手:“一种是用说明法应对,即用句子、短语或词组进行说明解释;另一种是直接造新的词,对外来概念加以命名。”(沈国威,2008.7.19)由于农科词汇属于专业术语领域,仅靠解释、说明手段是无法完成近代农业科技和农学学科的建设与发展目标的,所以创制承载着新概念、新信息的新词汇必然是优先选择的方式。而怎样选择、如何破解这一难题,从历史渊源、现实情势与汉语的天然优势来看借用汉语似乎成为了不二法则。

#### 四、结语

明治时期日本在借用汉字“凭音表意”地创制新式农科词汇上恰恰表明了汉语是具备与西方文明接轨的语言潜质和生命力的。通过本文的实证研究,我们可以看出汉日语言的历史依存关系、汉语富有抽象性与概念性的优质特性、汉字的高结合度与旺盛的产殖性是近代日語词汇体系建构过程中汉语起到同构作用的关键。日本人发现了这一,想方设法将其落实到了实处并取得了显著成果。故此,日本学者今野真二指出:“汉字·汉语对日本、日语来说是长久支撑‘公共生活’的存在”(同上,今野真二,2014:12),将汉语糅合入日本而进行的孜孜不倦的努力至今仍未停歇。如果断言汉语扰乱了日语就与其一刀两断、将其舍弃的话,“我们很容易否定掉与现在关系密切的过去、充满新式表现的将来以及在社会中引起多样变异的现在”。(笹原広之,2014:4.)

由此可见,汉语的历史功绩是不可以一带而过的,它的出现、传播与定型对近代以来的日本甚至广大汉字文化圈的变革与演进、固型与发展,都起到了无法替代的划时代作用,而这种作用至今绵延不衰、方兴未艾。正因为如此,它也在提示我们,中国传统的语言文字经过漫长的历史选择和考验,形成了与自身社会文化相匹配的特点与体系,在与异质文化发生摩擦、冲突的时候,我们是

指责、破坏它还是竭尽所能地维护它、发展它、创新它，也许日本的做法值得参考和借鉴。

参考文献：

- [1] 沈国威. 近代日中語彙交流史——新漢語の生成と受容[M]. 東京：笠間書院，2008：13-14.
- [2] 沈国威、内田慶市編. 還流する東アジアの近代新語訳語[M]. 大阪：ユニウス，2014：283
- [3] 加藤周一·丸山真男. 日本近代思想体系 15——翻訳の思想[M]. 東京：岩波書店，1991：350.
- [4] 日本放送協会放送史編修室. 『日本放送史 上』[M]. 東京：日本放送出版協会，1965：427
- [5] 杉本つとむ. 近代日本語の成立と発展[M]. 東京：八坂書房，1998：314.
- [6] 沈国威. 汉语的近代新词与中日词汇交流—兼论现代汉语词汇体系的形成[J]. 南开语言学刊，2008（1）：72-88.
- [7] 今野真二. 日本語の近代[M]. 東京：ちくま新書，2014：8.
- [8] 垂水雄二. 厄介な翻訳語——科学用語の迷宮をさまよう[M]. 東京：八坂書房，2010：6.
- [9] 安江良介. 翻訳の思想——日本近代思想体系 15[M]. 東京：岩波書店，1991：327.
- [10] 森岡健二. 改定 近代日本語の成立 語彙編[M]. 東京：明治書院，1991：7.
- [11] <http://ktymtskz.my.coocan.jp/ueda/x6.htm#0> 付録6 農業と人口日本工業の黎明——遣隋使から工部大学校まで—— 上田弘之著 昭和56(1981)年刊国際電信電話株式会社
- [12] 明治23年大日本农会农谈会报告、明治20-24年官报1094号、1059号、1471号、1564、1817号、2188号、2402号
- [13] 葛本仪、王立庭. 建国以来对“词”“词汇”概念的研究[J]. 语文建设，1992（4）：31-35.
- [14] 鈴木孝夫. 日本語と外国語[M]. 東京：岩波新書，2007：3
- [15] 沈国威. 近代译词是怎样创制的[Z]. 文化交渉学のパーспекティブ，ICISシンポジウム
- [16] 笹原広之. 漢字に託した「日本の心」[M]. 東京：NHK出版，2014：4.

基金项目：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农业科技日源词汇汉译受容实证研究”（12YYB005）；中央高校基

本科研业务费-南京农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日语借词的适应化翻译与语言的自我调节效应分析”

（SK2015024）；南京农业大学外国语学院院级课题资助项目“日语借词的汉译演变及本土化研究”（KT2014003）。

作者简介：李红（1971—），女，南京农业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日汉近代科技词汇翻译及交流、语言文化研究论、中日科技文化比较研究。